

# 參加抗戰準備工作之回憶

陳立夫

本文摘自民國六十六年六月在台北出版之近代中國季刊第二期，承蒙作者陳立夫先生提供珍貴圖照，謹此致謝。

— 編者

一個強國處心積慮要侵略一個毗鄰的弱國，這個弱國，如果沒有一位深謀遠慮忍辱負重的領袖，他的亡國命運，是註定了的。中國對日抗戰八年，最終竟能勝之，在全世界軍事專家看來，無不認為奇蹟。

回憶在民國十三年冬，國父曾在日本神戶發表演說，以「大亞細亞主義」為題，希望日本以亞洲王道文化，來領導亞洲，影響世界。他以結語正告日本說：「（日本）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，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？就在你們日本國

民去詳審慎擇。」可惜當時日本缺乏有眼光的政治家，不能採納他的忠告，終於走向霸道的途徑，不惜自相殘殺，十三年之後，爆發了中日戰爭。

為準備抵抗日本的侵略，準備工作，十分艱鉅，除了軍事方面，本人未直接參與，所知極少外，內政及外交方面，亦曾略盡棉薄，茲略述其所能記憶如下：

## (一)

當德日義三國在醞釀成立軸心聯合組織，尚未簽訂「反共公約」之前（二十六年十一月六日在義簽字），奸雄的史達林立即搶前一步，從外交及組織宣傳兩方面採取行動，以免將來被日德東西夾擊。在西面設法與法國聯盟，以減輕本國及法國有單獨被德國侵略之恐怖，同時使希特勒一旦戰事開端，必將自犯所著「我的奮鬥」(My Camp)一書中所稱不能東西兩面作戰之錯誤。以後且復與德國共同分割波蘭，以鑿其慾。在東面則滲透其工作於日本少壯軍人方面，以助長其侵華之氣燄。在中國則鼓動學生攻擊政府之不敢抗日，在軍隊中則鼓吹停止剿共，抵抗日寇，以促成中日之戰爭。張學良、楊虎城即受共匪

煽惑之人，為保持實力，高唱抗日，張並期以「不抵抗將軍」之頭銜，轉加諸中央領袖，終致造成西安之事變。蘇聯之決策極為高明，惜乎軸心國家之領袖，均見不及此，且無遠見，各逞其私，坐失時機，卒致此一組織，有名而無實。希特勒竟自犯錯誤，東西雙方作戰，而敗於蘇聯。中日戰爭，雖我方用盡方法，以求避免，並以爭取準備之時間，仍不能使盧溝橋事變之不爆發。

## (二)

日本之侵華，日益加劇，其時外交部長係當時行政院長汪精衛兼任，其實際交涉工作，由次長唐有壬為之，零碎應付，日見其窮。一日余往謁汪，建議其本乎「國父之理想提出遠大之計畫與日本洽商，至少可使轉移日本軍閥之目標，使之北進或南進而不西進，以減輕我國之壓力，此乃吾人應有之當前外交政策，並推薦戴季陶先生以任其事，必要時余可助之。汪認為不可能，亦無意一試。余乃與先兄果夫詳商，照此情形，中日戰爭，必不能免，則我方應如何與中共接洽，使之共同抗日，並使蘇聯不利用中日戰爭以助中共擴展。惟茲事體大，且須絕對保密，否則足以瓦解剿共軍心，且足以使日寇侵略之加速，利未得而害先至，故必須請示。蔣公得其許可而後進行。



民國二十七年一月本文作者任教育部部長時攝。

(三)

在江西剿匪期間，吾方最重要之工作，為安定後方，使共黨在各省之秘密活動，隨起隨滅，余為主持我方此項工作者，助余之高級幹部大半為美國留學生，且多半為習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者。

吾人所採取之政策為滲透與招撫，不採殺戮，使共黨自首自新，而予以思想之改造，其有能力者並予錄用。故來歸者甚為踴躍，清黨後十年之間為數幾達兩萬人，其最著者為共匪方面主持特工之顧順章亦經蔡孟堅同志之接洽，暗中來歸，此一轉變，幾使共黨各地之地下組織全部瓦解。周恩來竟以毒辣手段將顧之妻子密捕，活埋於上海法租界一屋中，而自身亦無法躲藏於上海租界中以指揮工作，周本人苟不十分機警，遲走五分鐘，則亦為吾方人員捕獲矣。（此一經過為周來渝開政治協商會議時，在余家晚膳，親口告余者。）周逃赴香港，不敢露面，吾人苟欲與之接頭，十分困難，遂託曾養甫同志設法，找諸小岑、黃華表等同志，覓取接頭線索，蓋據吾人之推測，蘇聯之策略既為促成中日之戰爭，而共匪又怕吾軍之繼續進剿，蘇聯勢必令共匪表示願意投降，以加強吾人之抗戰決心，而共匪本身由江西逃至陝北，精疲力

薄，亟待休息，唯有採共同抗日之政策，始可圖存，而周之尋覓與我方接頭之心，實較吾方為更殷切，而接頭之對象，亦以余為最適合之人選，否則將無安全之保障也。廿四年秋黃等得周恩來致先兄與余一函要求停剿，願意共同抗日，其函原文如下：

果夫兩先生：  
分手十年，國難日亟，報載兩先生有聯俄之舉，雖屬道路傳聞，然已可窺見兩先生最近趨向。黃君從金陵來，知養甫先生所策劃者，正為賢者所主持，呼高應遠，想見京

果夫先生收

分十年，國難日亟。報載，先生

確有救國之志，惟最近趨向。黃君從金陵來，知養甫先生所策劃者，正為賢者所主持，呼高應遠，想見京

先生之志，非若此。先生之志，非若此。

先生之志，非若此。先生之志，非若此。

先生之志，非若此。先生之志，非若此。

先生之志，非若此。先生之志，非若此。

先生之志，非若此。先生之志，非若此。

先生之志，非若此。先生之志，非若此。

先生之志，非若此。先生之志，非若此。

先生之志，非若此。先生之志，非若此。

先生之志，非若此。先生之志，非若此。

先生之志，非若此。先生之志，非若此。

先生之志，非若此。先生之志，非若此。

先生之志，非若此。先生之志，非若此。

先生之志，非若此。先生之志，非若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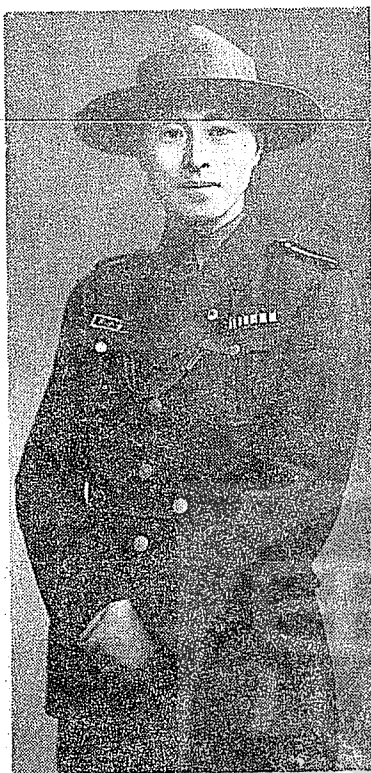
周恩來致陳果夫先生及本文作者函墨蹟。

周恩來

十一月

中今日之空氣，已非昔比。敵黨數年呼籲，得兩先生爲之振導，使兩黨重趨合作，國難轉機，定在此一舉。

近者寇入益深，僞軍侵綏，已成事實，日本航空總站，且更設於定遠營，西北危亡，迫在旦夕，乃國共兩軍猶存敵對，此不僅爲吾民族之仇者所快，抑且互消國力，自速其亡。敵方自一方面軍到西北後，已數作停戰要求，今二四兩方面軍亦已北入陝甘，其目的全在會合抗日，蓋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國，敵方現特致送貴黨中央公函，表示敵方一般方針及建立兩黨合作之希望與誠意，以冀救亡禦侮，得開新徑，兩先生居貴黨中樞，與蔣先生又親切無間，尙望更進一步，立停軍事行動，實行聯俄聯共，一致抗日，則民族壁壘一新，日寇雖狡，漢奸雖毒，終必爲統一戰線所擊破，此可斷言者。敵方爲貫徹此主張，早已準備隨時與貴方負責代表作具體談判。現養甫先生函邀面敘，極所歡迎，但甚望兩先生能直接與會。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，務望立夫先生，不辭勞悴



民國二十七年本文作者兼中國童子軍總會理事長時攝。

，以便雙方迅作負責之商談，想兩先生樂觀事成，必不以鄙言爲河漢。

臨穎神馳，竚待回教。專此並頌  
時社

周 恩 來 九月一號

該函經呈閱後，奉命繼續聯繫，由余等出名口頭答復，允予轉呈，惟不必立即告以蔣公已允予考慮。此一線索，始終聯繫未斷，以待時機之來臨。

(四)

中日關係，日見堅強。若干重要問題須待中央全會決定。依本黨慣例，每屆大會或全會開幕之前，必先謁總理之陵，然後返回中央黨部開預備會議，會後攝影以留紀念。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日本黨四屆六中全會開會照例攝影。正在攝影時，汪精衛突然被刺客狙擊，背骨中彈，幸無大礙。刺客爲一通訊社記者，當場被衛兵槍殺。搜其身上，祇獲出入證一枚，爲孫鳳鳴所有，經晨光通訊社所領去者。兇手既死，查究較難，而此次最大之特殊情況，爲蔣公未參加照相。於是



民國十五年(一九二六)本文作者在美國畢次堡煤礦公司做礦工，手提飯籃留影。

謠言蠱起，有人疑爲有政治背景；有人則認爲主戰份子不滿外交之懦弱而出此(時汪兼外長)，汪夫人陳璧君女士與陳公博等則公開在黨部揚言，謂蔣公每次參加照相，何以此次不去參加，顯有陰謀主使之嫌疑，刺客當場被殺，更有滅口之嫌。衆說紛紜，幾成政潮之起因。惟此次蔣公何以不參加攝影，因從陵園返黨部時，感覺秩序凌亂，精神不佳，故不欲出而參加，不料竟出了大亂子，事雖巧合，終感有理說不清。是日傍晚，蔣公即召余前往，謂此案必須立即澈查，早日破案，庶能澄清謠言，以防政局有變。問余需要多少日子，其時余對此案雖已命徐恩曾、戴笠兩同志着手查究，惟刺客已死，通訊社又久已屋空無人，竟大膽答允蔣公，試以一星期爲期。出後，即從孫鳳鳴之入黨表上介紹人二人方面入手逐步推究，凡與其直接及間接有關者，一一傳來查詢，竟於鎮江附近拘獲其同謀者賀步光、張明英等人，承認刺汪不諱，當時中央黨部對於此案組成有專案小組委員會，陳璧君亦爲委員之一，乃將人犯交由該委員會審訊，始知謀刺汪者，爲汪之小組織(改組派)中份子，因汪登臺後，置彼等工作生活於不顧，忿而出此。該案真相大白，一場風波，於焉平息。在全國一致對外之情勢下，內部因誤會而發生破裂，最爲不利，幸余偵破此案，僅費五天時間，蔣公心爲之安，對余嘉勉有加。距此案不及兩月(廿四年十二月廿五日)，唐有壬被刺死於上海車站，聞爲反

余已出國，案情如何，則不能記憶清楚矣。

(五)

日本圖華之野心日益顯著，吾方外交除竭力應付外，無他方法以旋轉乾坤。迄自偽滿成立後，我方與日本先後訂立「淞滬停戰協定」、「塘沽停戰協定」、「秦（德純）土（肥原）協定」……，以應付及遲緩其侵略，藉以爭取時間，此種不得已之作爲，恰好予共匪以最好理由以攻擊政府之懦弱退讓。血氣方剛之青年學子，最爲激昂，易受煽惑，我政府日夜準備尙感不給，忍辱負重以爭取時間，既不能以準備作戰之事實告國人，又不能輕易作孤注之一擲，以求一時平抑國人之忿怒，正如「啞巴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出」。

蔣公爲應付此種局面，特指定陳果夫、張道藩、谷正綱、劉健羣、張厲生、賀衷寒、滕傑、曾擴情及余九人爲青年指導委員會委員，以余爲召集人。余于廿四年聖誕節前數日奉命去蘇聯，商談對蘇軍事同盟，隨行者爲張冲同志，以其能說俄語也。在啓程之前，余曾以書面建議 蔣公，謂全國大專學生之高呼抗日，雖其後臺爲共匪，大半仍出諸愛國之熱忱。若僅憑黨的組織之運用，採疏導與防制之辦法，必至有時而窮，其結果徒使本黨于青年學生以不革命之影響，損失太大，宜採積極之方法，似宜由 蔣公命令教育部轉令所有校長率領各該校學生代表二三人來京，聽候蔣公親自訓話，曉諭政府之備戰實情，與輕舉妄動之危險，以及共匪主戰之用意，俾代表回校後將親聞于 蔣公者口頭密傳其他活動份子，使共匪之煽動伎倆無由得售，則收效必宏。此一建議，竟蒙採納，于廿五年一月十六日付諸實施，果收實效學校叫罵之聲漸戢，社會亦漸呈安定之象。此時余在國外，未能親見其結果也。此一指導青年工作在余出國期間，奉命由先兄果夫代理。

(六)

余向來未辦理過外交工作，初次嘗試，深感惶惑，蔣公授以機宜，知此一使命，須絕對保密，故均用化名之護照，余名李融清，張冲爲江某（其化名不能記憶清楚矣）。聖誕節日乘德國郵船 Poston 啓程，同船有赴德上任之程天放大使及其隨員，二等艙中則有曾經聽余在該校講演之電雷學校畢業學生二十餘人，去德進修者。由上海至馬賽航程十餘日，保密工作，幾乎不可能。然終以計畫周詳而達成，惟一知曉余等在船上者爲程天放大使，但亦不便與余等來往。由馬賽搭車抵柏林，蟄居待命赴莫斯科，時希特勒當政，特工密布，即蟄居亦不易，蔣公認爲去蘇時機未到，命去他國走走，惟隨時與程大使以電訊聯絡，因之余與張冲得觀光法國、瑞士、捷克、匈牙利、南斯拉夫及義大利等國，行動十分謹慎，以防遇到熟人，致洩漏事機。其間雖有數次驚險，幸未誤事。在國內中央各種會議，報端未登載余出席之消息，已啓外間疑竇，幸余書有親筆信十數封，由內子從杭州郵寄南京親友，告以在杭養病，隔數日寄出一封，故尙能應付保密。惟日本方面，首先放出試探之謠言，謂余被派赴蘇，蘇方對此消息至爲害怕，恐軸心國家因此而早日動手，蔣公乃不得不改變計畫，令余返國與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在京交涉，余遂與張冲同志分途返國，以避外人耳目。余經奧國之維也納、南斯拉夫而達希臘，渡海至海法（現以色列都城），再從「甘如」搭荷蘭 KLM 班機抵新加坡，再搭貨輪去上海，不料該輪到連香港後，奉命先經日本裝煤，抵埠幸未被日本海關上船之檢查人員發現，否則余之使命，將被日人暴露，解釋不易矣。此一機密之冒險使命，將來有暇，可寫成一短篇之小說也。

(七)

余出國已將三月，裝病亦不宜太久，及時返

國，亦所必需。返國後兩事必須同時積極進行，以爭取時間，一爲與蘇聯鮑格莫洛夫大使進行交涉，二爲與周恩來進行商談。前者之目的在訂兩國軍事同盟以應付日本之侵略，惟鮑大使於請示後，認爲軍事同盟僅對吾國有利，使日本不敢輕舉妄動，惟一旦瘋狂之日因侵華事發，蘇聯亦必牽入戰爭，若德國乘機東侵，蘇聯仍將東西作戰，且使蘇聯被侵之機會增加，殊爲不妥，故不願考慮。余認爲其理由亦尙充分，遂退一步要求訂一互不侵犯條約，即日本如侵華，蘇聯不得乘機直接或間接（指援共）侵華；日本如侵蘇，我國亦不得聯日以侵蘇，如此則雙方有利，此一原則，鮑大使於得到指示後，同意進行。惟仍絕對保密，經多次磋商，互不侵犯條約之文字，漸漸就緒。一日余與鮑氏在余家中傾談中蘇兩國之關係，余曰：「惟有一個三民主義的中國，對蘇聯最有利；一個共產主義的中國，非但對蘇聯無利，而且有大害」，彼不明白，欲余解釋，余曰：「你能在全世界找到第二個主義，够得上做你們的朋友如三民主義嗎？資本主義？法西斯主義？納粹主義？這些都是你們的敵人，惟有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頗有相似之處，如果現在的時候，中國是共產化，日德義軸心聯合攻蘇的決心更堅，日本侵華也成了他們反共的最好理由，豈不是你們要自速其亡嗎？如果將來中國共產化，你想你們能制服一個比你大三倍多人口的中國嗎？」他贊成我的看法，並且將我的話用電報打回莫斯科，蘇聯外交部檔案中當可查到。在討論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時，鮑氏曾數次向我保證一旦中日戰爭爆發，他們決不幫助中共。在抗戰前期及中期，他們確是做到所諾，後來於戰爭將結束時竟與日本訂互不侵犯，並援助中共，乃造成違約失信之大錯。這是共產國家之慣技，固不足爲奇。

他跟着就說：「中共祇有二、三千兵，他們如果不聽話，你們就把他們消滅算了。」這時候蘇



聯祇希望能促成中日戰爭，他們就是犧牲了中共和亦不惜，國家至上，勢所必然。一切商量妥當後，廿六年八月廿一日由當時外交部長王寵惠與鮑大使簽字，惟余未經參加，這一條約在抗戰爆發後兩個多月（九月廿二日），才公開宣布。

(八)

蘇聯的態度既已明顯，對中共的交涉，自然不難，我們首先決定把周恩來請到上海，惟中共派員與余談判，必須有第三國際代表參加，這是潘漢年。他們兩人必須先得到余之安全保證，始肯來上海，我方則由張冲任聯絡員。那時候的情形，我們好像是接受中共投降，他們祇要我方肯停止剿共，提任何條件，他們都可接受。日寇一旦侵華，就是給他們以復活的機會，條件可以隨時食言，到了那時候我們自己抗戰不暇，自難對他們為有效的約束。我們知道他們怎樣想法，他們亦知道我們怎樣做法，但是為對外必須表示全國一致抗日起見，我們要求他們在戰爭爆發以後，即應發表共赴國難宣言，包括下列四點原則：

①為徹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。②取消一切反政府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，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。③取消紅軍，改編為國民革命軍，受軍事委員會的統轄，擔任抗日戰爭之任務。④取消蘇維埃組織，改為行政區，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。

後來周潘二人，由我們招待至南京居住，由余直接和他們談判，使彼等更為放心。經多次磋商，宣言及條件的文字都已大體談妥，周恩來乃欲回延安覆命，余乃令張冲陪其去西安，順便往見張學良，由周口中說出我們雙方對共同抗日，大致已有協議，以免張再唱抗日高調，以保實力。潘則留京續洽，不料事隔數日，西安事變忽起，當時張冲與周恩來都在西安，外人罕知其原因何在也。其共赴國難宣言，於七七事變後，於同年九月二十二日與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同日公布。

(九)

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之起，楊虎城之罪惡，實較張學良為大，幸 蔣公之德威感人，且其住處已移在張之勢力範圍之內，故終能化險為夷，其詳見 蔣公自述之「西安蒙難記」，不再贅述。事發之次日，余召潘漢年來見，欲其將國內一致不直張楊之所為，以及中央採取嚴正討伐之方針，詳電第三國際，並述其個人之意見，謂萬一 蔣委員長有不幸，則日本之侵華，可傳檄而定，日軍可以中國為其基地侵蘇，於蘇聯為最不利，其電報密碼存在余處，且惟我方才有電臺，可直接通莫斯科，潘同意立即照此意擬一電報發出，次晨余又召潘來，請其再發一電，問周恩來是否尚留西安，若然，應由第三國際去電，令周不得有所損害 蔣委員長之行動，救蔣即所以救蘇，潘亦照辦。越二日覆電來到，謂「兩電均收到，爾之觀察，甚為正確，已電周遵辦矣。」余始放心。廿五日 蔣公被張護送回南京，全國歡騰，余隨黨內諸先進迎接 蔣公從機場至其官邸，眾皆散去，余獨留，至床邊，始知 蔣公背部受傷，至為疼痛，亟待休息，惟余仍急急欲知者為周恩來在西安之態度，遂以此為問，蔣公答曰：「甚好」，余復以鮑大使告余之言告之，因中央軍已入陝西，可供 蔣公在軍事方面作抉擇也， 蔣公默而不言，余遂辭出。

(十)

西安事變，為一最驚險之局面，然民心士氣之盛，已可以證明領袖德威，足以領導抗日。而日本之侵略，自亦日益亟迫。軍械之補充，自屬急需，尤其是飛機、大炮、坦克、高射炮、打坦克車等等重武器，當余與鮑大使商談互不侵犯條約時，已成爲附帶條件，而各有數目字之決定，遂即由 蔣公派張冲同志前往莫斯科，商談運輸

之途徑，以及供應之時間。一旦戰爭爆發，沿海各港口，均不能用，其唯一之路線爲新疆，於是余被派往新疆與盛世才督辦商洽，如何將汽油運至沿途各站，以供應此類重武器之需用，俾能及時補給我軍抗戰，此一使命，順利達成。後來漢口之空戰，我軍一次擊落日機二十餘架，使日本空軍有一較長時間不敢西侵者，即由此路運來之飛機之得用，而爲日方始料所不及者。此類武器，雖非最新之一種，但吾方軍人戰志之堅，殺敵之勇，技術之精，足以補救其缺陷而有餘，戰後余因此而獲得空軍獎章，足以自慰。惟 蔣公何以會派余赴新，蓋有其原因。在北伐出發時，盛世才服務於總司令部參謀處，余則服務於秘書處機要科，盛見余指揮科中同仁每日工作幾達十餘小時之多，衷心欽佩，故當其自赴新疆，擊敗金樹仁，以軍事統一新疆後，即電 蔣公請派余或齊世英同志，代表中央前往，其時余以事冗不克前去，中央乃派黃慕松先生（盛之老師）前去，以出言不慎，幾被扣留，蓋盛爲一多疑之人也。後來汪精衛與桂系密謀奪取新疆，勾結張里元部隊，不幸密電被譯出，張被捕而置死，故盛對汪極恨，而恨中央，幸 領袖聽余言以親筆函慰勉之，始告緩和。汪在院長時，有歐亞航空公司飛機一架，因機件故障強迫降落于迪化附近，盛扣留之不放，德國駐華大使，以嚴厲之態度，要求我政府限時令盛釋放，汪兩次去電，盛不置理，汪遂懇以余之名義去電爲請，次日即予放行，故余之去新交涉，極爲順利，政治上人事關係之複雜，有如是者，可不慎乎！

(十一)

計畫經濟之推行，在全世界以吾國爲最早，用之于人生不可一日或缺之食鹽，鹽之生產分配運銷，均有一定之區域劃分，稱之曰「引岸」。在某一區域內之人民，必須購用某一鹽場生產

之鹽，越界則為私鹽，設官以管理之，每一鹽場之生產成本高低不同，蓋鹽鹵有濃薄之分，天時有晴多雨多之別，不能採自由競爭之辦法，否則天津長蘆之鹽，其成本僅及江、浙、閩、粵三分之一而及川鹽十分之一，且其產量較多，自由競賽則沿海諸鹽場及自流井之鹽場均將倒閉，彼時一旦南北發生戰爭，北軍可停止供應食鹽，即能制南軍以死命。不料廿六年春若干立法委員僅憑一時之理想，起草新鹽法，採自由買賣制以打破「引岸」制為主要目的，該法之立法原則，必須先通過中央政治會議，審查此案時，以汪精衛為主席，余鑒於此事之危險，力持反對，余提出兩個先決問題請列席立法委員答覆：①中日戰爭是否可以避免？②戰爭若起，將在地何處開端為可能性最大？其答復為勢難避免，其開端為北方為最可能，余乃問：「屆時若吾方人民缺乏食鹽將如何抗日？」但立委仍予堅持，余要求退席，汪竭力勸阻，謂可從長計議，後雖將原則修改，以保持所有鹽場為主旨，採統購統銷辦法，不久抗戰開始，該法幸始終未成立，而浙閩鹽場，仍為供應東南及中部諸省自由區人民所需食鹽之主要來源，而四川自流井之所產，為供應西南諸省之需要勉足應付。一日余去自流井視察教育，得當地人民大規模之歡迎，主席並提及新鹽法，而參加人員，多半為鹽民而非教育人員，余不勝驚奇，彼等何以知中央討論新鹽法之經過，可見民生問題，為人人所注目，而國家重要政策，不可有絲毫錯誤也。

(十一)

蔣公之健康，為指揮抗戰之重要條件。自從西安事變發生之晚起，蔣公之背骨，因在黑暗中由華清池避暑後山而跌折，時感疼痛不堪，雖後來移居牯嶺休息，用各種方法醫療，仍無進步。一日，余往謁，詢悉其情，建議請南京城外一

中國骨科士醫生楊老頭子一試，此人為南京電力公司常備之醫生，因電氣工人，常有因電線線桿而跌傷者，中央醫院及鼓樓醫院醫生所不能治者，彼能為之醫好，最近並將內子全身關節痛治愈，其法用內功之力，雙手置人身傷痛處，一前一後，上下慢慢移動，為時約一小時，病者感覺傷處發熱而舒適，而漸漸痊愈，經蔣公同意，乃由余帶其上山，先請其理髮、沐浴，換穿新衣服，然後往見蔣公，開始診治，第一日蔣公即感到非常舒適，兩手亦能較前高舉寸許，於是繼續診治，每日上午下午各一次，兩星期而痊愈，蔣公大悅，酬謝其一千元（其平時診費為五角）。

蔣公問余，其治愈之原理何在？彼既不用力按摩，僅用雙手在身之前後移動，病者體內即有感應。余答以照余想法此乃人工靜電傳入病者體內，以助其本身恢復力之不足，其雙手乃代表電流之兩極，故稱「內功」，對病者而言，亦可稱之曰「外援」，故其本人必須早晚兩次練功夫，而于治病後自身出汗而感疲倦，蓋以己身電力援助他人而有損失也。蔣公亦以為然，謂此類技術，應使之多傳徒弟，毋使絕傳，以存國粹。但今之醫師法，已列此種人才為密醫而嚴加取締，不亦悲夫！

(十二)

日本報紙不自責其侵略之罪，而責吾國反日，並公開指CC（此乃共黨捏造之名詞，用以攻擊本黨忠貞幹部者，實際上絕無此一小組織，日人沿用之）及藍衣社為反日之兩大中堅勢力。是於初來華重要日人，均希望來見余。廿六年初，日本議員觀光團來南京訪問，要求見余，余以茶會招待之于寓所，寒暄後，余曰：「君等是否因聞余為反日激烈份子而來見余乎？」彼等大笑，余又曰：「君等知余為堅決反共者，而又認余為堅決反日者，豈非余為一不自量力十分狂妄之人乎？」續曰：「余可正告諸君，反共乃出諸余之

理智，故不能改變，余深信中國文化遠優勝于共產文化，且共產制度為一極端霸道蔑視人權之制度，與中國之崇尚王道，絕不相容，故余反對之；反日乃出諸余之情感，故隨時可以改變，祇要貴國不欺侮我們，放棄侵略，誠心與我友好，則余將首先主張親日。諸君如能將「孫中山先生于一九二四年冬在神戶之講詞『大亞細亞主義』細讀一遍，定能知你們今日之侵華政策，為自殺政策。」其國長遂向余直說謂日本議會實已無法控制軍人，中日前途殊難樂觀。余最後以余之預告之曰：「中日戰爭之結果，日本將為資本主義國家所控制，而中國將為共產主義國家所控制，兩敗俱傷，一無所得。」此語彼等有以筆記下來者，次日並見日本各報。惜乎日本軍閥專橫無知，戰爭竟難避免，余言不幸而中。八年戰爭告一結束，蔣公認為兄弟鬩牆，不宜各其既往，採取王道之過份寬大政策，使日方威能感到以德報怨之厚情，從此能為宏揚亞洲文化作先鋒，此一願望，迄今未衰。

以上十三則均與準備抗戰工作有關，惟我方始終希望戰事之能避免，鑒于蔣公在二十四年五全大會中所作之外交報告，可以見之，其中最重要之言曰：「和平未到絕望時期，決不放棄和平；犧牲未到最後關頭，決不輕言犧牲。」不料七七盧溝橋事變終於發生，使我國忍無可忍，和平既已絕望，犧牲在所不計矣。是日清晨，余去中央組織部辦公，見滿屋坐了中外新聞記者，爭先詢問：「此一戰爭，強弱懸殊，如何能打？」余曰：「今日不是能打不能打的問題，而是應打不應打的問題。人家一定要打我們，我們不能挨打，祇有抵抗，才有生路，而且全國軍民，一致願意犧牲，催促政府抗戰，政府怎能違反民意？」一位美國記者就問：「按照雙方軍力比較，貴國能抵抗多久？」余曰：「你是美國人，一定熟悉貴國開國歷史，如果那時候，僅以軍力作比較

，則喬治華盛頓與英軍作戰，能支持多久？亦決無成功之希望，而事實適得其反。其原因何在？須知民意之向背，才是決定勝負之重要因素，你的計算，忘了精神力量之偉大，單從物質力量一方面着眼，所以錯了，華盛頓持久抗戰之成功，

應該給你以最好的答案。」  
余籟曰：「十一年前余隨 蔣公北伐，當時北洋軍閥軍力之總和，數十倍于我國民革命軍，但是全國絕大多數的人民，站在我們這一邊，我們不到三年的時間，竟將軍閥全部打倒，統一中

國，這亦可以證明民意是戰勝者最大的主力，所以我們鑒于士氣民意之旺盛，全國上下一心一德，才有此堅強之信心，抗戰到底，不到勝利不止。」記者們聞之無言而退，而我們的極度艱苦時期從此日開始了。

天  
廬  
論  
叢  
序

劉季洪

民國十八年余至日本考察教育，乘船在神戶登岸，首遇黃天鵬先生。

時先生留學彼邦，並任申報海外記者，承詳告日本一般情形，並特別指出其各種預謀侵華之象微，囑於考察時多加留意。後在各地果見其教育措施盡力灌輸帝國主義思想，更以積極侵略我國為重心。例如當時其全國學校所用地圖，均將我國福建、東北及內外蒙古與其本土印為類似顏色，充分暴露急欲吞併之野心；同時其全國完成義務教育之青年，必須一律參加青年訓練所接受兵役以外之軍事教育，並有若干青年接受移民教育，學習內容完全以我國

東北為壟殖對象。因其早有侵我陰謀，故不久即發生瀋陽事變，以至演成全面侵略，現回憶與天鵬先生初次相識，距今已近五十年，而當時晤談情景，亦仍常在記憶中。

先生不久回國，除在大學任教外，並先後在各大報社主持筆政，而以抗戰期間總理重慶各大報聯合版最為艱苦，但對鼓勵民氣，弘揚國策，爭取抗戰勝利之貢獻亦最大。

此外，先生以任國民大會代表，特發起成立中國憲法學會，多年來負責中實際責任，使學會成為研究法學，促進憲政之重要學術團體。又以僑委會顧問數度訪問海外僑胞，時就對

於僑情之深切了解，多有建議，深為政府所重視。

先生更以長於文章，對於數十年來所從事之新聞事業、憲政工作以及僑務研究，均隨時發為偉論。其卓見遠識，固可永作指針，而各項史實詳明記述，更將成為後來學者研究之重要資料。

今年值先生七十大慶，故舊門人發起徵集詩文為壽，並選先生關於新聞、憲政、僑務著作，編為天廬論叢，以為紀念。余因識先生久，欣聞此舉，特亦謹述敬佩之忱，藉以略表祝賀之意。是為序。